



在五月想 像五月

游靜(美國)

有人持着斧頭由這個窗衝入來。亂槍掃射在鑲有鋼板厚三吋的門上。從書房早期、中期到後期的馬克思逃到甚麼都沒有的廁所大概只會更危險。隔壁的佐治還在嗎？打電話給弗烈達她會否有辦法？保鏢呢？我的文字你們會讀嗎？我的女兒，我所教導的，你們會明白她所信的，而不認為她是瘋子嗎？不要因為我的離開停止追求烏托邦。沒有它我們沒有現在。

我坐在托洛斯基最後的寢室內思想他的離開。保羅·拉度(Paul Leano)那不幸(榮)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弗烈達》(Frida)中有一場描寫利姆拿(Diego Rivera)在飯桌上跟托洛斯基說：「你如果多列列舉嗎酒，你們就不會弄成這個樣子！」托洛斯基聞言拍案而起。後來就正式由利姆拿的大宅運出。可以想像他如果一直繼續在利姆拿家作客，他可能有機會進一步思索國際社會主義的前途，或者，再寫一點關於墨西哥的革命跟蘇俄的革命的異同。與利姆拿決裂時大概已預料了這一天。他的小圓眼鏡望着所有人的未來，自己現在這一刻卻連上廁所都害怕窗子外的風聲是槍聲。

現在托洛斯基紀念館的小花園內正中央豎着共產黨的旗。他並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他被葬於這枝旗下。早幾天一個教授問我錄影帶裏面一直出現的紅色代表甚麼，是喜慶與歡騰嗎？倒沒想過共產主義的紅色跟中國傳統的紅色本來是兩樣事情。我們這一代這個地方的人對紅色有恐懼症。拍錄影帶有時是為抵抗和治療紅色恐懼症。

跟你說這些時我看到你豎着滿頭亂草的頭髮在笑。那種笑容我在電影中看你寫給弗烈達的信中見過。你會不會厭惡我常常提到「電影中的」你，認為我基於認知錯誤，是以分不出真假？我跟你相隔了一百年，你知道，人類從未曾在一百年內像這一百年經歷的這麼多。我跟你活在一卷電影菲林開頭與結尾的兩端，而不是辯證法的兩端。你跟你的同志維托夫一樣

被放逐——現在我們大部分在你的國家以外的人都同意他是影史上最優秀的紀錄片導演之一，甚至可能替人類拍下了第一部實驗紀錄片——但那個時候即使他如何歌頌史太林，如何以攝影機與文字想像烏托邦，他的美學還是被黨日益封閉的美學所不容。甚至被最擅鑽的「蒙太奇大師」愛森斯坦譏為攝影技術的雜耍。托洛斯基，我知道如果你活在今世，你一定不會再堅持經濟決定論，視文化為經濟基層的超結構這樣簡單。你甚至可能會指出，現代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潰敗有相類似的脈絡，現代主義提出藝術的自主性/非政治化跟社會主義一心使藝術政治化到頭來跌入同樣的陷阱，最後一起抱住浸死在商品軍事集團的垃圾池裏。

托洛斯基，本來只是為了五月會經帶來的一切，好比幻覺而曾經不是幻覺一樣的渴望，本來只是因為連你喜歡的弗烈達今日亦被完全商品化的諷刺——那倒不是拉度電影的功勞，他的電影反而對羣衆無痛無癢，大衛·連治才是「成功」出賣(加促)了弗烈達被異(物)化的市場潛能。甚麼是成功？顛覆？革命？你搖頭，今日我們的麥當娜就是最成功的顛覆。葉利欽要禁了共產黨，他宣布今年五月是「非意識形態性的」，他以為只有共產主義才是意識形態，剛好跟馬克思主義打對台。

今日我坐在一間由一個極權共產黨政府撐腰的報館內趁着面前(這辦

公室內的桌子一張一百八十度面向另一張)的同事睡着的時候跟你說話。我並不特別害怕偷聽器，因為偷聽器不是最可怕的。這張彎着腰的報紙與在報紙內彎着腰的人不介意被偷聽或者偷聽，因為已經沒甚麼秘密。沒有甚麼不可以被預料。由僱主到僱員都只是在一個資本主義世界找不到比一個共產黨更好的買主而已。

對面的同事開始醒來，從一個矮身的果醬瓶子喝一口濃咖啡。瓶子的標貼仍在，已經完全變黃，從前它曾經一度載着木莓果醬，現在裏面盛着深褐色的液體。他喝了半瓶咖啡，瓶子上半部就有泥漬似的東西分布在玻璃的內壁。招紙上的木莓卻倒是分外鮮艷地在紅，由我這個角度望過去，一共有四枚，也許歷史真的只是一個腐爛、衰敗的過程，累積下來的只有渣屑。他翻開一份報紙，很久很久看着一個相同的點，我想他又睡着了。五月的天氣本來是清新的。有人說清新的一切總是朝向衰敗。一個拿着巨斧的人由寢室一直追到書房去。他假裝是你的信徒，你的兩名秘書都已死在門外。他可能會經真是你的信徒，但他在這一刻選擇相信列寧所代表的權力。比列寧更壞的還要來。你的大門鑲着鋼板，你來不及拉開來走到花園外面去。我坐在花園想像你的死亡，總是聽不到門內的叫聲。我從窗子外探頭望過去，只見你端坐在書桌前，隔着防彈玻璃向我微笑。

